

鐵馬危七六西南(八)

楊森

辨講武堂收韓國生

我以一師之衆，解成都圍，驅走滇軍，自己便在瀘州歇馬，希望能够從此開創一個小小的局面，我不同成都，參與羣雄角逐，那是因爲一來我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，二則瀘州是川南重鎮，地阜物豐，在經濟價值上，她遠勝過稅源不寬的成都，第三的一層原因呢，很簡單，原來的川軍各部，他們也要有個安排。

前此川滇兩軍在成都打仗，當時有舉足輕重之勢的黔軍將領戴戡，他一直在隔岸觀火，聲色不動，很明顯的他是想利用這個天下紛爭的機會，遂行漁翁得利的妙策。果然，滇軍圍我，我破滇軍，有一個短時間，他也如願以償的當了四川省長兼督軍。

戴戡總攬四川軍政大權，也想因襲羅佩金的的手法，以黔軍治川施以高壓政治。這一次又是劉

存厚不服氣，川黔軍發生衝突，戴戡力戰失敗，死在亂軍之中。

滇黔軍走的走，垮的垮，四川又復陷于混亂。民國七年，熊克武佔領成都，劉湘據重慶，川北則爲劉存厚的勢力範圍。民國九年十二月，熊克武勝劉存厚，入主成都，稱川軍總司令。

我不管他們的事，我開始在瀘州埋頭經營。就在這一年，我的職銜是川軍第九師師長，兼任川南道尹。我的根據地是瀘州，因此我經營川南的目標是整軍修文，齊頭並進。

順利攻入瀘州的時候，我已經有一萬多人的兵力，後來我儘量擴充，先有郭汝棟的一個團歸誠，後來又招安了范紹增的一股巨匪。郭汝棟是工兵出身，護國軍之役，他在劉存厚軍中任工兵營長。范紹增又名海亭，渾名哈兒，他是袍哥禮字輩的『大哥』，輩份不高，頗有潛勢力，他的部隊全部袍哥化，不分階級，一概兄弟相稱，打

起仗來倒是驍勇得很。

護國軍興，獲得勝利，滇軍駐紮四川，當時頗有久遠之計，趙又新在瀘州，經常和我談起一個問題。他鑒於滇軍的中下級軍官，多半是由士兵積功洊升上來的，他們教育程度不高，智識水準偏低，作爲現代軍官，確實難當重任；當時曾有人提出建議，何妨把他們送回雲南，進雲南講武堂繼續深造。但是趙又新以爲昆明遠在千里之外，長程跋涉，很不方便，後來他徵詢我的意見：是否可以在瀘州設立一所雲南講武堂分校。

我知道，他所以這樣問我，是因爲我在民國二年，曾經担任過四川軍官教育研究所的教育長，川軍中有不少將領，都是我的學生。在二軍高級將領中，對於辦軍事教育，我勉強說得上是內行，於是告訴我他說：他這個計劃，非常之好。

雲南講武堂瀘州分校成立之後，我以二軍參謀長的身份，負起實際責任，這時候，分校除了

調訓各級軍官，同時也吸取一些當地的優秀青年，培養陶冶，期能成爲未來的幹部。在我廣安家鄉的子姪親友，也有若干志向遠大，希望投筆從戎，以及見我有了相當的地位，想來投奔我的。我都叫他們到分校讀書，作爲他們一生事業的起步。

雲南講武堂瀘州分校辦理的時間不久，從外面招收的學生更少，但是其中居然也出了幾個出類拔萃，功勳卓著的名將，譬如在抗日和戡亂戰爭中迭有特殊表現的楊幹才，他是我的侄孫，當時也是這間學校的學生。

滇軍敗走，我出主川南軍政，爲了培養幹部，作育人才，我把雲南講武堂瀘州分校，改做瀘



也曾担任過護國川軍總司令，在本文作者楊森將軍之前任職四川都督的劉存厚將軍。

州第九師講武堂，這所學校成立於民國七年，其間很教出不少優秀軍官，當時韓國亡於日本已久，許多愛國志士，紛紛投奔我國，一方面表示他們義不帝秦，不甘爲亡國奴，另一方面，也想在中國接受軍事訓練，在異日復國運動中大獻身手。在民國七年那麼早的時候，於川南瀘州如此一個偏僻遙遠的地方，韓國志士投身第九師講武堂的，就有四十餘人之多。

二次大戰後，韓國早已復國，如今蔚爲東亞中流砥柱，而我的那些韓國學生中，如前駐華大使金弘一，著名將領金震等人，對於韓國獨立，和抗共戰爭，都有極大的貢獻。又如其中的一位趙鏞濤同學，曾在我的部隊服役，後來且曾積功

升任上校。

第九師講武堂是我軍隨營教育的嚆矢，自此以後，我每駐防一地，只要環境許可，我都有軍官教育機構的設置。

兵荒馬亂

川南道尹

我担任川軍第九師師長，兼川南道尹，時間是在民國六、七、八、九這四年間。民六、民七、民八、民九，國內的政治情勢很混亂，南北政府對立的局面已經粗

定。北洋政府方面，袁世凱死了，黎元洪繼之，在他的手裏，國會被解散，臨時約法被廢棄，六年六月六日，國父孫中山先生號召西南各省討逆救國，七月一日張勳要出了宣統皇帝復辟的鬧劇，黎元洪去職，馮國璋代理總統，九月一日，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國父爲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空軍大元帥，十日就職，宣告載定內亂，恢復約法。七年五月，非常會議又選舉國父等七人爲軍政府政務總裁，十月，徐世昌在北平當了大總統，十一月，由北政府先行下令前方部隊罷戰退兵，護法之役，宣告結束。

民國八年十月十日，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，公佈總章，九年七月十四日直皖戰爭爆發，從此以後，北洋軍閥不斷的內訌，內戰，兵連禍結，東南與中原一帶，生靈塗炭，民不聊生。然而四川省內，這四年之間却由於滇黔兩軍相繼被驅逐出川，川中將領，雖然偶有小規模的衝突，但是就全國的大環境而言，總算是出現了小康的偏安局面，我在川南，因而也就得以專心一志，埋頭於地方建設。

我常以爲，一個人的思想、興趣和志業，往往會隨着年齡的增長，眼界的拓寬，以及心胸的擴展而有所變更。孔夫子曾喟然而嘆：『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。』但他如能留心觀察，他便會曉得河床有深淺淤穴，水流有寬廣窄逼，河道殊異，水勢不同，天下事幾乎是沒有一成不變的。

兒時在鄉，家裏不許我習武，我偏練騎射刀弓石，當年愛看小說，看的是三國與水滸，伯父愈禁，我越看得起勁，對於書中『路見不平，拔

刀相助』的俠義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的忠誠，每每使我熱血沸騰，心胸壯闊，這些小說強有力的引導我矢志成爲桓桓武夫。

後來進學校了，聽老師一再重複的講：科學要緊，船堅砲利第一，彷彿不從事科學研究，就不能挽救國家民族的淪亡。因此有一段時期，我想在聲光化電諸學中消磨一生。

當了軍官，由於接觸的人物較多，閱讀的書報更廣泛，因之心志又隨而不變。我熟讀資治通鑑，也嘗遍閱中外文學名著，閒來無事吟哦舊詩，與古人攜手同賞春花秋月，暇時輒以寫字賦詩自娛，依稀彷彿自己也是位才高八斗的斗方名士，那是我一生中最浪漫的時期。民國二年，我和熊克武從事二次革命失敗，應黃毓成之請隨軍入滇，接觸了蔡松坡、唐繼堯、李烈鈞等人，又耳聞目睹雲南的政治種種，更使我對政治工作產生了莫大的興趣。

在瀘州，我的勢力範圍在瀘縣、資中、內江富順、江安川南一帶。我的部隊共有王續緒、王正鈞和楊春芳三個旅。續緒、正鈞，二王都是我在成都速成學校時的同學，楊春芳是我最早收編的土匪，他可以說是我一手培植出來的一支武力。——我的勢力圈擴充最廣的時候，我會進駐川中最富庶的自流井，那裏是四川岩鹽最大的產地，以出產而論，它可以說是全四川最富庶的地方。

從此我暫時不求向外發展，我明白攘外必先安內的道理，我要運用有利時機，建設川南。我當川南道尹的時期，經常召開民政會議，

集合我轄區的各縣縣長參加，向他們闡說治理地方的要旨。當其時，江安中學有一位數學教員盧作孚（又名盧思），上了一封萬言書給我，條陳一切政治改革，應自教育入手，而以教育統治人心，爲基本準則。他建議我應該設一專門機構，延攬各種人才，他強調的說：『事得人而能舉，無人才即不能發生力量。』

他這個說法，深獲我心。我一望而知，他的建議很有價值，於是我便召見他，和顏悅色的問：

『你是那個學校畢業的？』

盧作孚坦然的答道：

『我沒有進過大學。』

我有點不大相信，再問他：

『那你怎麼教得了中學的數學？』

『我會經在成都一個補習學校讀過幾天。』

『你現在的程度怎麼樣？』

他還是老老實實的回答：

『教中學嘛，勉強還可以對付得過去。』

那時，正好教育科有一名科員缺，我問他：『你可否屈就？他謙遜的說：願予一試，——作爲施展他生平抱負的起點。這是我與民生公司創辦，日後的中國航業巨子盧作孚關係的開始。』

學校教育，先自整頓川南師範入手，我聘譚代英當校長，鄧演達、蕭楚女、陳啓修等充教員，這班人都是屬於少年中國學會的，民國八九年間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具體的組織，甚至於連共產黨的名稱亦未產生。少年中國學會算是很左傾的團體。譚代英能說善道，頗有煽動力量，我一再的告

誡他說：我爲了造就川南子弟，我只看重你們的學識，事事向進步方面做，以及教學認真，我請你們專心辦學，不管外務。但我還是怕他們會有野心，因此我把他們的行動，局限於學校之內。那時候他們在學校裏辦得有川南日報、正報月刊，宣傳他們的思想，進步而偏右，和我的見解大同小異。

我又設立了川南圖書館，館址設在瀘州，藏書近八萬冊，在四川全省恐怕這還是首創。川南道轄二十七縣，北迄仁壽，南抵合江，我在這個廣袤千里的區域裏，首先設置瀘州、江安、隆昌、富順等五六間中學，校長一律是北平大學畢業的川籍飽學之士。到了後來，我更完成一縣一中學的空前之舉，川南道有二十七縣，便有二十七間中學。這一點，事隔若干年，尤爲川南人士津津樂道，引爲自傲。記得當年瀘州中學的校長卽爲劉航琛，劉在北平大學讀經濟，他是瀘州人，世代經營釀酒業，愛人堂的香花酒，馳譽全川。他雖然出身富家，但却矢志向學，博聞強記，後來成爲四川不可多得的財經人才，抗日勝利後一度膺任經濟部長，迄仍在台。

除了舉辦學校，我更注重人才的延攬和培養，何北衡當時擔任我的祕書，他爲了鼓勵川南學子求得高深的學問，竭力鼓勵青年人出外留學，記得當時我會硬性的規定：但凡有人負笈遠遊，留學外省或外國，我一律每月給予一百銀元的津貼。

由於我的竭力提倡學術文化，漸漸的，史無前例的，川南一帶變成了全四川文化教育的中心

，隱隱取代重慶，成都的地位。當年外國人或外省人要參觀四川的文教建設，當軸都請他們到川南來看看。

在川南道尹任內，做了許多事情，確曾發生了相當可觀的影響。四川將領，或則出身仕途，或則崛起草莽，民國初年，國勢積弱，初經大變之餘，分崩離析，羣雄割據，四川一省，從來不曾出現過統一的局面。做官的五日京兆，朝夕政情不一，帶兵的，往往變生肘腋，生命前途，竟然取決於掌握兵權的部屬一念之間，而朝秦暮楚，賣主求榮，求質財求獲高位，早已司空見慣，不足為奇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軍閥作風，沛然以興，軍閥之稱，可大可小。但凡人佔據了一塊地盤，他的首急之務，唯有二端，一是開一個造幣廠，先來操縱金融命脈，經濟大權。二是設一所兵工廠，造鎗隻，鑄子彈，務使軍火供應，不致斷絕。

再其次就該橫征暴斂，括地皮，借錢糧，使自己的財富越積越多，腰纏萬貫，方始可以予取予求，或則收買敵軍將領，或則準備自己萬一失敗，出奔逃亡的資金。於是在這種攘利為先，不恤民命的作風下，四川省的老百姓開始大遭其殃，民國十年以前，居然有將田糧賦稅，預先徵收到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四十年以後的，搜括之狠毒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四川將領人人擁兵自保；斂財自重，對於民生疾苦，地方建設，當然也就無心，抑且無力兼顧。誰會過問街道寬窄？誰肯收容傷兵乞丐？外患不已，內政窳劣，於是乎天怒人怨，他們的情

勢也就岌岌可危，憂心忡忡，甚至夜不與寐。看到我在川南大興建設，幹得有聲有色，我的作風使他們有所警惕，影響所及，他們也在想要埋頭建設，爭取民心，至少他們想要和我同樣的受到民眾愛戴。

就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微妙心理狀態下，四川全省，七千萬民眾開始蒙受川軍將領的福祉。

民國十年前後，四川戰亂頻仍，兵連禍結，在羣雄角逐，各自為政的局面下，以我的力量最大，聲譽最高，外間的奧援也多。當熊克武倡呼『川人治川』，經過大家的努力，滇黔各軍都退出四川了。於是由熊克武担任川軍總司令，劉湘任副總司令，川軍編為兩個軍，熊克武統第一軍，劉湘是第二軍軍長。第二軍轄有唐式遵、潘文華等師。

劉湘看我在川南幹得有聲有色，實力也在一天天的擴充，他想跟我合作，自願把第二軍軍長一席拱手讓給我。我覺得蟄居川南，終究偏促得很，實在難以發展，為了施展胸中抱負，於是便欣然應邀到重慶。我所任的川南道尹，則交給我的部下旅長王續緒代理。

更益一境進駐重慶

民國九年，我到重慶，就任川軍第二軍軍長，兼重慶市政督辦，衛戍司令，和第九師師長，軍政重責，集於一身。但是我有計劃，並且有決心，要將重慶及其附近轄區，全盤整理建設，使其面目一新。

重慶，在周朝時是巴子國，秦置巴郡，漢曰

巴州，梁云楚州，隋唐為渝州，宋改茶州，淳熙年間設重慶府。民國後改設巴縣，後又改重慶市。抗戰時期，國民政府西遷，以重慶為陪都，前後歷時七年，於是改為特別市，直轄行政院。她簡稱『渝』，則是由於隋唐時代的渝州而來。

秦朝所置的巴郡，範圍很大，保寧、順慶、夔州、重慶四府都在其內，連瀘州也是它的轄區。因此，我的故鄉廣安，從前也是屬於巴郡的一個縣份。

四川全境，由北而來的一條大江，是嘉陵江，由西而東，則為金沙江下游的長江。這兩條大江，恰巧在重慶會合，以是重慶右嘉陵而左長江，自古以來有這麼一句話：『金蜀之水，傾注於此！』不僅四川一省，連康藏滇黔，甚至陝甘甯青一帶的山貨，長江下游各地的海貨舶來品，溯江轉運，都以重慶為集散之地。光緒二年，烟台條約訂定關商埠於城外，十七年正式開放，可說是西南第一大商埠。

重慶地形，其實是一座半島，突出於揚子、嘉陵兩江之間，它的形狀，很像一隻大嘴鵝，浮屠關以高屋建瓴之勢，控制全城，位置恰在鵝頸上。整座山城，建於坡坎起伏的山崗上面，由江岸到馬路，要爬幾百道石階。城裏的街道，因為遷就地勢的關係，忽起忽伏，往往有很高的坡度。全城有朝天、千斯、臨江、通遠、南紀、儲奇、望龍七座城門，其中六座，面江而築。

重慶的北邊，隔着一條嘉陵江，有江北縣城和它遙遙相對，正南方面由儲奇門過渡，便是川黔大道的起點海棠溪。在重慶四週有東、南、西、

北四處溫泉，而以南北兩溫泉最具規模，向為重慶市民郊遊沐浴的好去處，它對岸的塗山，相傳是禹后的故里。重慶城內，街道縱橫，自高處眺望，萬瓦如雲，鱗次櫛比，實在是一個很繁華熱鬧的大都市，商業區。但是當我就任的時候，全重慶只有白象街、望龍門、和鷄街口、朝天門一帶，才有幾幢新式的洋樓，其餘大都是土牆瓦頂的平房，沿江那些陡峭的石岸，還有老百姓凌空的架屋，下面用木頭或粗竹支撐，顛巍巍的支起好幾丈高。上面臨街的地方，居然搭得起兩三層竹篾牆，薄地板的樓屋，密密麻麻的不知住了多少人口。

民國九年重慶只有二十多萬居民，但却是沒有自來水，同時由於全城建在岩山之上，事實上更無法掘井鑿泉，因此重慶市民食用所需，除了偶然接些雨水以外，完全依靠成千上百的担水伕，從沿江各處，一挑挑的担水上來。這些人以担水為業，分送各家，世代相傳，不以為苦。他們成羣結隊，排成長長的行列，下幾百級坡，勺兩桶江水，回頭再攀幾百級的高坡，上大街小巷，送到長期僱主的家裏，工作一成不變，陰晴雨雪習以為常，而且絕對不能休息。長年累月，辛勤勞苦的工作簡直使他們成為機器。担水伕和江上拉繆的繆伕，他們有一項特徵，那便是兩肩皮膚磨成了紫色，有些『資深者』，肩膀的胛骨都壓彎了，深深的陷下，出現兩處明顯的凹痕。

重慶居民，食用全部依靠兩江之水，然而就在担水伕魚貫上下的江邊，却到處挖得有最簡陋，最骯髒的『公廁』，便溺遍地，羣蠅亂飛。這

種公廁，沒有屋頂，也沒有圍牆，就在石坡之旁，行人絡繹不絕的地方，挖一個大坑，上面鋪起一條條的石塊，兩石之間，距離不到一尺，因為隔得太寬，就怕便溺者一不小心會摔下去，那將會有生命的危險。如廁者上這樣的廁所，等於是在衆目睽睽之下露天方便。坑大又深，石條更長，擁擠時人在上面排成一串串，夏日炎炎，臭氣足可薰得人發昏。而最糟糕的，還是糞便的出路唯有大江，而江濱正有人一挑挑的担着食用水。

這麼大的一座國際商埠，西南大城，街道狹隘狹窄，寬度不過一二公尺，所以重慶的交通工具，除了驢馬轎子，就只有一種名為滑竿的便轎，全部竹製，乘客半躺在粗竹條上，看藍天麗日，白雲悠悠。大街兩旁的店舖，生意清淡的時候，對門的老闆或伙計，可以各自倚着櫃台，閑閑的談天。

治安方面，也是大成問題，出七星崗，到了兩路口，便是阡陌縱橫，一片田園風光。上清寺、牛角沱以外，都還沒有開發。一過歌樂山，常有小股的土匪出沒無常，攔路打劫，甚至殺人越貨，綁架勒贖。城中心區，由於西南各省的物資在此集散，長江上游手法高超的小偷扒竊，便也經常在重慶大顯身手。每天晚上九點鐘過後，七座城門緊緊關閉，邏卒不絕，如臨大敵，而把許多大商家，大貨棧，輪船碼頭，投宿客商，全部關在城外頭。

對外交通，兩條大江，不見一艘輪船，載客運貨，全都使用揚帆、划槳、拉繆的大小木船。航空方面，因為全四川沒有一座飛機場，所以四

川人也從來不曾搭過飛機。陸地要道，北往成都一千零五十里，坐轎子或走路，通常都要十一二天，電話電報，除了軍用，老百姓根本就無法利用得到。

這就是我担任市政督辦當時的重慶，而前後兩三年之間，我趁連年爭伐的餘暇，埋頭努力，經之營之，我使重慶奠定了初步建設的基礎。抗戰初期，中央政府全部遷移到重慶，沿海一帶各大城市的重要工業，大部集中到重慶附近，重慶容納過六倍於原有的人口，它成為抗戰的司令台，全民的精神堡壘，東亞的燈塔，經過歷時數年的毀滅性轟炸，她仍然屹立無恙，支持全國抗戰，直至勝利來臨的那一天。

在重慶大興建設，短短兩三年間竟然做了那麼些事情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我施展鐵腕，大刀闊斧，與利除弊。我個人肯破除情面，大公無私，當然我就不怕任何人加以掣肘，同時，我有了建設新川南的經驗，我將我在川南道尹任內的作風與故法，全部移到重慶來，孜孜矻矻，竟我事功。

楊天驊是得力助手

重慶的大小街道，是我排除萬難，加以拓寬的。大溪溝、渝簡馬路、南區馬路、縣廟街、陝西街、大樑子、小樑子、都郵街等等，它們能有抗戰時期的繁華闊大規模，都是我當年多方面努力的結果。在重慶興教育，普設學校，以及民衆教育機構，如圖書館、運動場，我仍舊按照在川南的老辦法，硬性規定，強制執行。重慶所屬的

大小縣份，每一縣必須有一所中學，一間圖書館，一座運動場。

至於衛生，我首先從觀念上的改變着手，全力宣傳環境衛生的重要，設置衛生管理人員，重慶近代化的醫院，西醫西藥的推廣和提倡，我都用了很大的氣力。改良公廁，實行挨家挨戶的衛生檢查，清潔用水，而且又開始籌設自來水廠。這些工作，曾經佔據了我很多時間，化費了我不少的心血。其結果，是使重慶市的環境衛生獲得顯著的改善，更重要的，尤為我給重慶市民帶來了新的觀念，人人都應該對環境衛生負起責任來。

另一項化費氣力較多的，是整頓治安，自我領軍主政以來，我到任何一地，首急之務便是肅清匪盜，維護秩序安甯。因此，我從不容許我所管理的地方，有一名土匪強盜小偷流氓，甚至有一個乞丐存在。重慶附近的股匪，一聽說我當了市政督辦，不需要我清剿，他們就自動的偃旗息鼓，悄悄的轉移到我轄區以外。而我在重慶，又拿出川南行之有效的辦法，一抓到流氓小偷和乞丐，立刻送進習藝所，強迫工作，讓他們能够自食其力，從此安份守己，不再為非作歹。

因為我又担任第二軍軍長，又兼攝重慶衛戍司令，在治安工作方面，我不免要特別的加以重視，當時在這一項工作上給我幫助最多的，是我的憲兵團長楊天驊。

楊天驊和我素無淵源，他既不是我的學生，也不是我的親戚。他原先是在田頌堯的軍中，有一年，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，備致仰慕之忱，有

意投身麾下。我見他那封信寫得不亢不卑，文情並茂，便覆了一封信給他，我開門見山的問：你那封信是自己寫的吗？

不久，他又寫來了回信，他說，信確實是他自己寫的，如果我不相信，他請我儘管面試，當面出題目，叫他作文章。

這樣坦坦白白的回答，很好。我當即再覆信去，喊他過來，於是他來了，我親自召見，見他年紀只有二十多歲，氣宇軒昂，人也長得漂亮，我問他在田頌堯那邊，担任的是什麼職務？他說，他在當機關槍連的連長。我說好的，你到我這裏，我還是派你帶機關槍連。

早年在川軍之中，機關槍是一項很重要的資產，他剛從田頌堯軍中過來，我就把機關槍連交給他帶。我實在是向他表示，我愛護他之切，信任他之專。

他果然發憤努力，把那連人帶得非常之好，訓練嚴格，風紀優良，士兵的技能與體魄都有進步，每次考核，他一連都能冠於全軍。我知道這是很不容易辦到的事，因為在我的部隊中，我對各方面的要求向來很高，楊天驊能在短暫時期之內，出人頭地，確實不太簡單。

至於他個人，忠誠負責，任勞任怨，能盡職責，筆下七佳，無論我交給他什麼任務，他都能順利圓滿的達成。他在我部隊裏兩三年，立過無數汗馬功勞，冒險犯難，攻堅摧銳，楊天驊每一馬當先，萬死不辭。因此，他晉級很快，兩三年後，他就當上了憲兵團長。

從前部隊裏的憲兵團，士兵素質特別高，武

器配備頂好，打仗的時候，不光是衛戍後方，前線督戰而已，遇有最危險、最重大的任務，他們往往是要去打頭陣的。楊天驊這個人，確實是一位率領憲兵團最適宜的人選。

四川內戰揭開序幕

至於其他的建設事項，犖犖著者，如像我完成了四川全省最重要的那條成渝公路，由重慶市的兩路口起築，途經璧山、永川、榮昌、隆昌、內江、資中、資陽、簡陽八個縣，直抵成都城內。這一條公路，計長五百餘公里，使過去要走十多天的行程，縮短到僅祇一天半。同時，由於成渝公路的告成，還間接的促使四川統一的局面，提早實現，結束了自民國開元以來，十多年裏，成都重慶始終分立的不合理現象。

在我的規劃與努力之下，珊瑚壩建立了中國第一座江上沙洲的飛機場，長江裏開始航行大小不一的各國航輪，民用的電話和電報開放營業，機器工業也如雨後春筍紛紛建立起來。

如果不是連年用兵，兩三年裏我曾四度進軍成都，其中還有一次失敗出川，遨遊荆宜、武漢、洛陽、長沙，整整耽擱了一年多的時間，我相信我還能够為重慶市民，乃至四川同胞多做些事情。當我辭離重慶市政督辦職務，就任四川督軍兼省長時，重慶不該還停留在成為近代化的起飛階段，它可能已經名符其實的，列為西南第一個近代都市了。

為了軍事第一的迫切需要，我採用我自己的方針，無時無刻，不在加緊訓練我的部隊。

在瀘州我開辦過第九師講武堂，到重慶我又成立了規模更大的軍事講習所，這是我訓練基本幹部的學府，我對它全神貫注，事必躬親，每星期我都親自去向學員們作精神講話，有許多教材和講義，也由我親手訂定。

第二軍是全四川最大最強的一支武力，我有編制完整的三個師，亦即唐式遵、潘文華和我自己的第九師。劉湘的職銜則是川軍總司令。

唐式遵和潘文華的兩個師，兵員充份，武裝配備都很好，我在劉湘的全力支持之下，將這兩師軍隊，不斷的加以整頓，加強訓練。我希望將來當我指揮他們作戰的時候，能和我自己的部隊同樣的發揮力量。

當年四川的情勢，熊克武率領川軍第一軍，佔據萬縣、綏定、順慶一帶的地盤。劉湘統領第二軍開府重慶，勢力範圍在重慶附近十餘個縣，我則兼任川南道尹，兼二軍九師師長，仍還領有川南二十七縣。

等到劉湘被推舉為川軍總司令，這位同班同學和我更進一步合作，將他名下的軍政大權全部移交給我。這時候，我所從事的第一次大戰役，便是應下川東熊克武的要求，和賴心輝、熊克武組成聯合戰線。

劉存厚在四川內戰諸役之中，始終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，他出身日本士官學校，曾經在雲南講武堂任教，因此和滇軍頗有淵源。民五護國軍役，他的防區在瀘州敘永一帶，當時他因不堪北洋軍的壓迫，乘機反正，敞開大門，迎護國軍順利北上，可說是頗有功勞。洪憲帝制告終，護國

軍大獲全勝，酬庸功勳，分茅列土，身為首義元勳的劉存厚搶先抵達成都，然而滇軍總參謀長羅佩金代蔡松坡為四川督軍，頭一件事就是要改編劉存厚的部隊，他為請求自保，和羅佩金部在成都巷戰，倖獲勝利，及黔軍戴戡為四川督軍，川軍不服，於是成都巷戰又起，這一仗，戴戡死于亂軍之中。又由我的老師周駿先生，以川軍第一師師長身份，督軍四川。後來護法軍與熊克武聯合滇黔軍圍攻成都，周駿棄職而逃，熊克武攻下成都，自稱川軍總司令，坐鎮成都，因而使得川軍將領普遍對他不滿。

劉存厚所轄僅祇鄧錫侯和田頌堯兩部，鄧錫侯字晉康，保定軍官學校出身，民國元年，四川起義成功以後方始回川，他的臉型長而圓，大眼直鼻，嘴唇豐厚，兩頰圓潤，生就一副風流俊俏小生模樣，此人能言善道，機智多變，在川軍將領中，素有「水晶猴子」的綽號，由此可見他的八面玲瓏，肆應有方。

打起仗來，鄧錫侯和田頌堯一樣，都有其可圈可點之處，勝不驕，敗不餒，倘論外交手腕，鄧錫侯又比田頌堯略高一籌。劉存厚是他們的統帥，然而不論文治武功，他的才幹都不能和這兩位部下相提並論。

熊克武入蓉，我們便接收下川東、萬縣、順慶、綏定三府，於是在獲得熊克武的同意以後，率師南返，以免重慶空虛。不久，劉存厚的所部，在四川將領中崛起了兩股新興勢力：鄧錫侯與田頌堯。他們二人協力齊心，打敗了熊克武與賴心輝，從此他們不再接受劉存厚的節制，在四

川諸將領之中脫穎而出，鄧田聯軍的聲勢相當浩大。

到這時候，四川省的局面，又重寫新頁。鄧錫、侯田頌堯以新銳的姿態，守在成都，熊克武棄兵曳甲，退回川東，我和劉湘擁有足以底定全川的兵力，却仍然倚處重慶至瀘州一線，我部官兵誰都不肯甘心，同時我們更急於再求發展。因為當時的這幾步棋，始終擺不平衡。

數年前看到一篇文章，說是四川自從民國元年以後，到民國二十三年為止，在此二十三年之間，四川的混亂，演出大小戰爭四百八十多次，平均每一個月要打兩次仗。我對於四川內戰不會做過統計，因此不能力斥其非，但是，我却要在記述我所參與的「內戰」之前，先說一說內戰發生的原因。

鼓輪東下突擊萬縣

「秦失其鹿，羣雄共逐，分裂山河，皆為戰場。」數千年來中國的亂興，正是循此通例，嬗遞演變。三國演義上用這麼一句話，來說明這種現象，即所謂：「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」三國時代，袁紹的謀士沮授也曾說過：「萬人逐鹿，一人獲之，貪者悉定，分定故也。」

滿清鼎革，各地隨義旗之所舉，羣雄並起，中華民族出現滿日生機活潑的氣象，國家由積弱而發奮圖強，海內外輿論，都說東亞這隻睡獅，終於醒了。但是由此一氣象，同時又給中國帶來內亂頻仍，紛爭不已。單以四川一省而言，從川路風潮，辛亥反正開始，內戰打了二十多年，這

些內戰的發生，兄弟鬩牆，煮豆燃箕，究竟是爲了什麼呢？簡言之，一方面是整個國家大環境的動盪不安所使然，另一方面，則爲掌握軍隊的人，個個雄心萬丈，都想施展抱負，全在處心積慮，爭取『天下爲乎定，定於一』的理想境界。

劉湘是我在成都速成分校時期的同班同學，民元民二，我在川北底定全局，大有發展，由於身爲職業軍人，軍令斷不可違，我曾將我的軍隊移交給他，從此他在四川算是一個脚色，利用他靈活的手腕，深沉的機智，縱橫捭闔，時仆時起。民國六年以後，他千方百計的拉攏我，兩個老同學一合作，不久就創出了很大的局面，當時我們的勢力範圍，幾佔全川之半，而且，四川的富庶精華地區，如重慶、瀘州、內江、自貢，全部掌握在我們手中。

力量膨脹，必須發展，這和冷縮熱脹的物理作用並無二致。第一次應熊克武之邀，合攻佔據川北的劉存厚，原意就是要擴充地盤。然而劉存厚被撵走了，他的部下鄧錫侯和田頌堯却脫穎而出，打败了熊克武，仍舊保有成都一帶。熊克武退回萬縣、涪陵、忠縣。在我和劉湘的心理，不但看不起他的顛覆無能，而且對他還有一股怨氣。這是我們決心驅逐熊克武的表面理由。

內在的原因，則基於萬縣是川中第二處大商埠，地阜物豐，稅收額要佔全省第二。還有一點，熊克武盤踞下川東，恰好封住了我和劉湘的咽喉，阻擋我們向東發展的進軍路線。

熊克武參加同盟會很早，四川起義之前，他也曾經出生入死，發動過幾次起義，但是自從二

次革命失敗，他的『長衫軍』，便成爲四川人譏諷嘲笑的對象。他能够得到革命黨的有力支持，然而他不能打仗，他的軍隊平時耀武揚威，打起仗來一聽槍砲就跑。民國十一年我曾以一萬多人，打下他的根據地，繳了他四萬多人的槍，這是古今中外聞所未聞的戰役。——不過熊克武有後台，他摔倒的次數很多，爬起來却最快。大多數的四川將領，因而對他都都很輕視，這在熊克武本人來說，也是無可奈何的悲哀。

攻成都一仗功敗垂成，我的軍隊一退却，他便被鄧田殘軍打败下來。熊克武回萬縣以後，對我和劉湘非常恭順，我們一說缺米缺糧，他便忙不迭的照送不誤。大概他也知道：倘若我向他發動攻勢，他在萬縣即將存身不住。

民國十一年七月七日，我們對外說是秘密出動，檢查貨物，調集了一師精銳，分乘五艘大輪船，清早由重慶起碇，黃昏時分就駛達萬縣二十里處。這時候我命令拋錨停泊，五隻輪船就在江心裏等待天黑。

天一黑，我便率眾捨舟登陸，悄悄進抵萬縣街市附近，突然間槍砲齊鳴，大聲鼓噪，趁熊克武的部隊毫無戒備，一舉攻入市中心區。熊克武的長衫軍，當時已經來不及集合了，就此四散潰逃，熊氏本人率領殘餘之部，急急往西逃竄，最後抵達梁山集中。

我這一支奇兵，兵不血刃，佔了萬縣城池，按照我們早先擬訂的計劃，劉湘所領的一支軍，這時已經攻佔長壽，正向梁山進軍途中。於是我們乘得勝餘威，分一半軍隊跟在熊克武後面急追，

終於使熊軍陷入前後夾擊的陷阱，打得熊克武全軍覆沒，落荒而走。

兩軍會合，先頭部隊仍然由我親自指揮，當時涪陵、萬縣、忠縣三城俱下，熊克武的地盤全部被我們接收。我軍北進已經到了大竹，直拊渠江左岸，那裏是何光烈的勢力範圍。我的計劃是不妨進軍到此爲止，先休養生息，撫輯逃亡，收編熊克武軍的潰散部隊。可是前敵總指揮是劉湘部下的一名旅長，名字叫李樹勛，此人桀驁不馴，不聽調度，他竟自作主張，乘勢攻打順慶府，惹出了一場無妄之災。

順慶府守將何光烈，是田頌堯部下的一名旅長，所部五六千人，訓練有素，能征慣戰。何光烈這個人傲骨嶙峋，目空一切，在順慶府駐紮了好幾年，跟當地民衆也處得很好，他和鄧錫侯是同學，在川軍中素以治軍嚴明著稱，不是輕易可惹的人物。這次我們要打熊克武，就怕田頌堯可能會幫熊克武的忙，出兵包抄我們的後路，事先特地派人到他那邊，送了一筆重禮，套套交情，深相結納。

熊克武退守成都

那曉得李樹勛不遵命令，貿貿然的去打順慶府。他忽略了順慶府在滿清時代是川北的兵略重鎮，綠營兵的順慶營便駐在這裏，城池高大堅固，嘉陵江繞城半匝，向來是易守難攻之處。李樹勛一旅人左衝右突，一直只有在城牆外面挨打的份。全旅死傷慘重，節節敗退不算，還當場陣亡了一位團長。

田頌堯、鄧錫侯，和劉存厚，都是聲應氣求，互有默契的。平時各行其事，不相統屬，一旦有警，立刻就會團結合作，槍口朝外。李樹勛惹了麻煩，劉湘連忙派人向田頌堯跟鄧錫侯講和，同時直接打電報給何光烈，說明這次誤會，完全是李樹勛不聽節制，私自行動，他說我們願意退出已經到手的廣安，表示和解的誠意。但是何光烈還在拿騫，拒不答應，我們迫不得已，再饒上一個大竹縣，雙手奉送給他，這場糾紛方始宣告解決。

熊克武的地盤丟得精光，退到成都附近，因為他有孫中山先生的背景，田頌堯、劉存厚、鄧錫侯他們便擁他出任川軍總司令，又一次造成蓉渝之間的對峙局面。不過在那時候，我們渝方為了應付事實的需要，在北平和廣州同樣的都派有代表，密切聯繫。

雖然一舉攻佔了萬縣，川東富庶地區被我們全部囊括，可是擊潰熊克武的結果，却促成了熊、田、鄧、劉的團結。熊克武逃到成都，又和鄧錫侯、田頌堯、劉存厚聯合起來，組成強有力的軍團，以應付我和劉湘日漸增大的壓力，從此我軍北方，又是強敵窺伺，亟亟不可終日。這個強敵不解決，說不定會有那麼一天，我和劉湘也蹈了熊克武的覆轍。

跟熊克武他們再打一仗不難，我們有把握對付得了田頌堯、鄧錫侯和劉存厚的聯軍，問題却在於貴州省兼黔軍總指揮袁祖銘，他手下有兩師一混成旅，是我們的後顧之憂。要跟熊克武他們打仗，勢必是一場性命相搏的惡戰，我們必

須使盡全力，以求勝利。到那時候，袁祖銘不說幫忙熊克武，就爲了他自己的利益，眼看素稱富庶的重慶空出來，他一定會從貴州北上，乘虛而入，揮軍進駐重慶，果若如此，我和劉湘就糟了。

在這種苦悶不堪的僵持局面裏，我們勢必要打開一條出路。軍事力量不足，我決定輔以外交手腕。首先我派人結納袁祖銘，信使往返，絡繹於途，終於雙方都在竭力表示友好。袁祖銘再三聲明：他決不和我們構成任何衝突，我們也保證決不侵犯黔軍，雙邊友好協定成立，我更進一步的請袁祖銘到重慶來舉行會議。開門見山告訴他說：四川必須統一，川北殘餘勢力必須肅清，——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。我又出奇兵，乾脆請袁祖銘參加出擊，我公開承諾，川局平定，攻下成都，我們就把涪陵一帶劃歸他的防區。

袁祖銘很爽快的答應了，誰知道他別有用心。雙方訂立協議以後，我的部下還曾向我提過：袁祖銘是客軍，我們不攔跑他已經够客氣的了，怎可以再許給他涪陵一帶膏沃之地。

我聽了微微一笑，我解釋給他們聽：現在我們的目標是統一全川，消滅盤踞川北的敵人，等到我們掌握了全省，力量够大了，如果袁祖銘想仍舊回到貴州，我們又何嘗不可以幫他驅逐勢將繼他而起的周西成呢？

可是袁祖銘並沒有合作的誠意，他分明是爲見風使舵而來，他一口答應跟我們聯合攻成都，但是一路上他的部隊始終都在後方逡巡，隨便怎麼他都不肯出擊，這一來他使我添了很大的心事。

這時候，開府洛陽的吳佩孚，和我訂有密約，他極願助我統一全川，我向熊克武進攻，他將從駐紮鄂西的北洋軍中抽調勁旅，作爲我的後援。

我揮師由成渝大路仰攻，打到內江附近，熊克武、鄧錫侯、田頌堯的聯軍死守不退，兩軍激戰多日，我的部隊傷亡甚多，雖然不算失敗，但是我必須率師後撤，重新整頓。這時候，吳佩孚派來的援軍已經快到榮昌，我決心將部隊撤到榮昌的前一站——隆昌縣，和援軍會師。

駐在後方的參謀人員，他們是負責與援軍切取聯絡，協助一切的，這些聯絡參謀爲密函來報告我，他們說：吳佩孚派來的援軍有張克齋的一個旅，人馬衆多，武器犀利，但是，就怕他們沒有作戰的決心。他們請我特別注意這一點。

吳佩孚派一旅來援

我回師隆昌以前，命張克齋佈置在隆昌前線，將前方佈署完畢，我才率部撤到隆昌附近，將部隊紮在城牆兩邊積極整頓。幸好，敵對的熊鄧田劉聯軍，大概也是因爲傷亡過重，亟待整補，他們並不會追趕上來，兩軍之間保持一段距離，又形成一個長時期的相峙局面。

和張克齋見面，檢閱過他的軍隊，北軍人高馬大，魁偉雄壯，武器服裝，以及一應配備，都比川軍優良。照說這支部隊應該能够打仗，但是我跟張克齋接連談過幾次，我立刻發現，我的

聯絡參謀，判斷十分正確。

張克齋彷彿是到四川來助陣吶喊，壯我聲勢的，他們不是不能打仗，而是不肯打。每次提到進攻，張克齋不是顧左右而言他，便是眉頭緊皺，面有難色，他說北軍遠路而來，在四川作戰，萬一受了損失，補充極為不易。我說這有什麼問題呢？四川的壯丁多得，你需要人，我隨時可以給你補充。張克齋顯然是藉詞推托，他又支吾過去，我不禁一聲浩嘆，從張敬堯到張克齋，北軍北軍，如斯而已。

隆昌四門狹窄，城池也小，但是成渝大道，亦即所謂的東大道，却直貫城中而過。大部隊進退，人馬輜重這麼多，萬一情形稍微混亂，極可能將城門堵塞，那就非常危險。每次想到這個問題，我都憂心忡忡，認為這個小城附近，實在不適於駐紮大部隊。

一日清晨，我帶幾名衛士，騎馬出城，遶行一週，當時被我發現另有一條石板路，恰好遶城而過，由隆昌城的北門遶到南門，我很高興，回城後立刻召開高級軍官會議，並且指定張克齋務必參加。我在會議上將榮昌週圍的道路情形詳細解說了一遍，我甚至點明了說：倘若我們必須從隆昌撤退，我們的撤退路線必須遶着城牆走，切勿不可穿城而過。

在隆昌和敵軍相持了兩三個月，敵方發動試探性的攻擊，張克齋旅在前方和敵人一接觸，頓時就垮。他率部撤退，匆忙中忘記了我的叮嚀囑咐，急急的往隆昌縣城退下來。一般部隊行進的方式，都是人馬在前，輜重在後；張克齋這一撤

退，當然是反其道而行之。北軍糧秣輜重衆多，前方連槍都沒有怎麼放，糧秣輜重可以說動都不會動過，後面敗兵催得急，以後隊作前隊的輜重還在城裏，對於張克齋的動向特別注意，我聽說他撤退，立刻下令他的部隊退到永川集中，後來我又怕他忘記遵照我指示的撤退路線，再補一道命令給他，叫他由北門遶南門，不必經過隆昌城。張克齋接到我命令的時候，城門堵塞的嚴重問題已經發生，他居然連個向後轉都來不及喊，却反而按照通常的規定，由旅部下達命令給團部、營部、連部，於是他的部隊進退維谷，亂哄哄的擠成一團。

我在司令部裏指揮全軍撤退，忽然聽到外面人語馬嘶，喧聲震天，急忙跑出大門，登高一望，但見人高馬大的北軍，宛如龐然大物，陷在一條小溝裏面，層層疊疊，挨挨擠擠，幾乎把隆昌城內的那一截東大道，都給塞滿了。我心想這還了得？萬一敵軍跟蹤而至，那他們真可以聚而殲之，亂糟糟的張克齋旅，豈不是連個還擊的機會都沒有嗎？

驚了驚，我立刻翻身上馬，在亂軍中找到了滿頭大汗，束手無策的張克齋。他一見我就愁眉苦臉的說：「這下可搞糟了，南門北門全都給堵死啦！」

我搖頭苦笑，點醒他說：

「南北兩門被堵，還有東西兩門呢？你爲什麼不遶道走？由北門再轉東西門大道？」

這一來，他如夢方醒，撥轉馬頭，奔向西門

，跑兩步，他像突然想起似的，轉回身，跟我敬一個禮。

我還怕他摸不清路徑，不放心，便催馬上前，親自帶着他，和他驚惶失措的部隊。出了西門把他們送上遶城的石板路。

張克齋這一次撤退，十足編制的三個團，一共損失了一個多營，一門砲，和無數的輜重。實際上，在隆昌防衛戰裏，他們却等於一槍都沒有放。

隆昌以下，就是永川，再往東北，來鳳驛、璧山一線，東大路穿過平原，沿途無險可守。我一看情形不對，決定索性退守重慶。守重慶抵拒北來的敵人，必須在嘉陵江兩岸設防。退兵途中，張克齋就向我要求，最好不要調他的隊伍入城，我當時就答應了他，將他的部隊，佈置在自江北悅來場、華筓山的一帶。那邊也有一條大路，直下重慶對岸的江北。我雖畀予重任，却是時刻對他很不放心。

重慶古來有「天生重慶」的俗諺，從來易守難攻，它的地形非常特別，浮屠關（抗戰時期改名爲復興關）以高屋建瓴之勢控制全城，嘉陵江和長江三面環抱。倘若沒有小型的海軍支援，浮屠關一失，守軍便無路可退，而且以當時的情勢，敵軍如果控制了長江上下游，我們無異陷入四面包圍。

還有一點，重慶雖然富甲全川，但是城內居民甚多，軍民糧糈，全靠長江和嘉陵江絡繹而來的糧船，我曾有多次守重慶的經驗，深知兩江的糧船一斷，重慶立將無法可守。（未完待續）